

邓小平爽朗活泼、爱说爱笑，富有组织才能和表达才能。

——徐君虎^①

留 学 莫 斯 科^②

1925 年秋，莫斯科中山大学正式开学，第一期学员共有 600 多人。我和蒋经国同班，而且分在同一个团小组，我们的团小组长就是邓小平。邓小平、蒋经国个头都不高，站队时常肩并着肩。

邓小平比我们都大，经验也远比我们丰富。1920 年 12 月，邓小平刚 16 岁就去法国勤工俭学，1925 年即已成为中共旅法支部负责人，因遭法国政府迫害于 1926 年 1 月与傅钟、任卓宣（即叶青，曾任中共旅法支部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叛变，后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现在台北，任台北大学教授），从巴黎到柏林，又从柏林来到莫斯科。在学校里，他们三人脖子上都围着蓝白道的大围巾，但个性各异：邓小平爽朗活泼、爱说爱笑，富有组织才能和表达才能；傅钟老成持重，不爱言谈；任卓宣像个书呆子。我、左权、赵可夫等初到莫斯科，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有趣，尽管天寒地冻，饭后总爱到学校对面的广场、公园和莫斯科河畔去散步，领略异国风光，边散步边聊天，尤其是听邓小平

讲在法国勤工俭学和那些惊心动魄、带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斗争故事，更是别有情趣。有一次，蒋经国和我问邓小平：你干嘛老围着一条大围巾呢？邓小平说：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去当清洁工，尤其是捡马粪，因为在法国捡马粪挣钱多，干一天能搞足一个星期的开销，最划得来，法国的清洁工都围那么一条围巾。我和蒋经国这才明白：邓小平他们为当过清洁工而自豪。

①徐君虎，当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邓小平是同学

②根据丹青、银知摘写的《邓小平任过团小组长》（刊于福建《每周文摘》 1988 年 3 月 9 日）一文摘编。

邓小平同志为了建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白天黑夜忙着，不仅精心地研究整个广西的革命形势，部署整个革命运动，而且对这次战斗中细致入微的后勤工作也考虑到了，这是一位多么难得的领导人啊！

——黄松坚^①

初 见 邓 代 表^②

我从广西东兰县武篆区赶来平马，已是第三天了。

1929年10月，右江两岸充满着战斗气氛。平马街上，人们脸上带着喜悦、兴奋而紧张的表情，来去匆匆，其中有全副武装的士兵，也有前来领取枪支、弹药的农民自卫军战士们。

早上8时左右，我在右江农民协会办事处门口，看见远远走来了两个人。一位蓄着大胡子的人——中共广西特委书记、省农民协会特派员雷经天同志，是我到平马才认识的。另一位我不认识，约20多岁，穿着灰布军装，人很精悍，边走边洒脱地与雷经天同志谈着话，不时地笑着，言谈举止给人一种干脆、利索和果断的印象，显得从容不迫和胸有成竹。雷经天同志的态度似乎对他特别尊重，认真地聆听着他的谈话，含笑地点头。这位是谁呢？为什么雷经天同志对他这样尊重呢？

我正想着，他们来到了我的面前。雷经天同志把我介绍给那位同志：

“这就是韦拔群同志的代表——黄明春同志。”（我当时的名字）

我当时是凤山县县委书记和农军总队长，又兼农会主席及农运特派员。5天前，我突然接到韦拔群同志的指示，要我作为他的代表，连夜从凤山赶来平马，找雷经天同志报到，并交给我一封写给雷经天同志的亲笔信。我走了两天多山路，到了平马。雷经天同志叫我与农协办事处的同志一起发枪支弹药，发给从恩隆、奉议、思林、果德等地来的农军队伍。我们一直发了两天，武装周围这几个县的农军。

雷经天同志介绍以后，这位同志以敏锐的目光，迅速打量了我一下，热情地和我握手，随即用带有四川口音的话语和蔼地问道：

“哦，你辛苦了，来几天了？”

我说：“3天了。”

这时，雷经天同志才向我介绍道：“这位就是党中央代表邓斌（邓小平的曾用名）同志！”

我一听，激动地向他伸出双手：“你好啊，邓斌同志！”我怎么也想不到眼前站着的就是早已听说的从中央派来的邓小平同志，更想不到我会在平马跟他认识。我紧紧地握着他的双手，一股崇敬的心情油然而起。当时的形势我们都很清楚，自从党中央派了邓小平同志来广西领导工作后，广西的形势越来越火红，右江两岸的

农民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如火如荼。前不久，邓小平同志和张云逸同志还把党所掌握的一支武装力量——广西省警备第四大队及教导总队拉来了右江。这两天，我们发的军械还是邓小平同志亲自率领警卫部队，从南宁押运来的呢！见到邓小平同志，我的心情怎能不激动万分呢？我的注意力完全被他吸引住了。

邓小平同志很忙。他环视了一下农协办事处里的人员，便要求我马上去执行一个任务。我一听，邓小平同志要我执行任务，感到多么光荣！原来他要我带办事处的人员到镇上各家各户去找南瓜。我心里打起了问号，现在一不是没有粮食，二不是没有菜，要南瓜做什么呢？我问他，他笑了笑，和藹地反问我：“你想不出来吗？”我说想不出来。他说：“那你先不要问，完成了任务我再告诉你。”说完又爽朗地笑了起来。

我虽然纳闷，但还是带着七八个同志去找南瓜。街上的老百姓听说我们的队伍需要南瓜，个个都争先恐后地拿了出来，有的还主动帮我们送到办事处的门口，我们算钱给他们，他们有的坚决不要，还说，你们打仗为穷人，如今要些南瓜算得了什么。约 9 时许，金黄色的南瓜堆满了办事处的门口。我马上将邓小平同志请来，指着这堆南瓜说：“党代表，南瓜找来了，你拿来做什么用？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吧！”

邓小平同志拍了拍我的肩膀，微笑着说：

“以后你会知道的。”

第二天，平马镇突然响起了枪声。在农协办事处

里，只见工作人员有的进进出出，有的忙着摇电话，有的在翻阅地图标记着什么，好一派紧张和热烈的气氛。这是张云逸同志领导的警备第四大队与右江沿岸的农军，在平马等几个地方，同时向反动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发起了进攻。第三大队队部设在平马，大队长是熊镐，士兵大部分是兵痞流氓。这支队伍与当地土豪劣绅勾结，妄图扑灭革命的火焰。我党为了在右江建立革命根据地，武装工农，扩大队伍，决定消灭第三大队。当天，驻平马的第四大队部分队伍，以演习和出操为名，在农军的协助下，直指驻平马的第三大队司令部。不一会儿，战斗胜利结束了。

邓小平同志走来，高兴地对我说：我们这次战斗十分顺利，但事前不能不估计到会有受伤的同志，现在我们的药品缺乏，而这南瓜瓢拿来敷伤口就是很好的药呢。瓢可以作药，瓜肉又可以吃，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

他的一席话，说得我们恍然大悟。我不由自主地用手拍着自己的脑袋，呆呆地立在那儿，望着他那因为熬夜布满了血丝而又充满智慧的双眼，陷入了沉思：邓小平同志为了建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白天黑夜忙着，不仅精心地研究整个广西的革命形势，部署整个革命运动，而且对这次战斗中细致入微的后勤工作也考虑到了，这是一位多么难得的领导人啊！

正当我这样想着，邓小平同志又说话了，他交代我们一个任务，要我们到第三大队队部去清点武器。我们

高高兴兴地接受任务，足足清点了两天。

清点完后的第二天，邓小平同志叫我去。他亲切地对我说，现在你可以回武篆了，请转告韦拔群同志带领农军继续扫清南丹、凌云、乐业一带的地主反动武装，武装工农，扩大部队。他说得是那样的清晰、那样的肯定，使我现在回忆起来还记得清清楚楚。

我接受任务后，第二天立即起程。归途上，不知是因为平马战斗的胜利喜悦还是因为见到邓小平同志后的激动心情，我总觉得浑身像有使不完的劲，步履越迈越有力，越迈越快。我还觉得似乎右江两岸的秋色今天变得格外秀丽，天空也特别的高、特别的蓝，空气也特别的清爽。我无限兴奋地想到：回到武篆，我不但要向韦拔群同志汇报邓小平同志的指示，而且还得把他叫我找南瓜的事告诉同志们，让大家知道，我们的邓小平同志不单是一位卓有见识的指挥员，而且还是一位考虑事情非常细致周全、体贴士兵的好领导者。

①黄松坚，当时任中共广西凤山县县委书记、农军总队长兼农会主席、农运特派员。

②原题为《平马镇初见邓代表》，《广西革命斗争回忆录》第1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第1版。

小平同志的精明干练，思路敏捷，谈锋犀利而幽默，三言两语就能抓住问题本质的能力，深深地吸引了我。

——王 震^①

24 岁的中央代表^②

1929 年，俞作柏、李明瑞回到广西，向中国共产党提出请求，派干部帮助他们工作。我党中央派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代表，和张云逸、陈豪人、李谦、袁任远、叶季壮、李朴等一批党员到广西工作。

当时，小平同志年仅 24 岁，可已经表现出非凡的胆略和领导才干。以他为首的广西党组织成功地、创造性地开展了统战、兵运和农运方面的工作。他们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排除党内“左”倾错误思想的干扰，卓有成效地对国民党左派俞作柏、李明瑞做了工作。李明瑞在党的帮助下，后来毅然拒绝了蒋介石高官厚禄的引诱，投身革命，由小平同志亲自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忠贞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李明瑞虽然长小平同志 10 岁，可在江西和我们在一起时，每谈及邓小平，钦佩之情总是溢于言表。

在俞作柏反蒋失败后，邓小平同志坚决走“朱毛”井冈山的道路，发展革命武装，果断地实现了党的中心

工作由城市到农村的战略转移，到韦拔群等同志领导的农运基础较好的左右江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在1929年12月11日和1930年2月1日，胜利地举行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建立了中国红军第七军和第八军，创建了全国瞩目的广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当时，我们在湘赣苏区听到这一胜利的消息都很振奋。红七军和红八军建立后，小平同志担任了两军总政委和前委的领导工作，由此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始人之一。我认为这两次起义有其独有的特点，为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丰富的经验。

广西红军建立并在当地坚持一段时间的革命斗争后，1930年10月“立三”路线传到了红七军，命令他们打桂林、柳州等大城市。经整编，红七军离开了右江革命根据地，开始了由广西经贵州、湖南、广东向江西中央苏区进发的小长征。在艰苦卓绝的进军中，邓小平同志以执行“立三”路线遭到的一系列挫折，启发教育部队，抛弃、抵制了“立三”路线。邓小平、张云逸和李明瑞指挥和维护了部队，转战千里，战胜了几倍以至十几倍的国民党反动军队，突破了黔、湘、桂、粤、赣军阀的重重堵截和“追剿”，克服了天寒地冻、山高路险等恶劣的自然环境，终于胜利地把广西红军带到了井冈山地区和赣南。

1931年春，我们从敌人报纸上获悉了张云逸同志率红军进到了湘南，3月他率红七军五十八团转战到了湖南酃县十都圩附近，我和谭家述率湘赣红军独立师第

三团前往迎接，远远地只见他们高举着经过日晒雨淋的军旗，背着广西特有的竹斗笠，挎着装饮水的葫芦走了过来。他们虽然经过长途跋涉，一路恶战，可红七军的战士们一个个仍是那样虎气生生，斗志昂扬。两支兄弟部队会合后，大家非常高兴，我们并肩战斗，连续打了几个胜仗。3月中旬，五十八团和我们独立一师三团进至茶陵县附近时，国民党湖南何健部陶广率两个团尾追而来，并派兵在我两侧迂回，我们两支兄弟部队联合与敌激战，结果歼敌 300 名，俘虏 100 多人，活捉了敌团长 1 名。这是红七军进入苏区后，与我们配合作战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

打下了茶陵，我们在攸县、莲花地区击退了敌人对湘赣根据地的围攻，部队稍事休整，这时就得知了红七军主力在邓小平与李明瑞率领下渡过东昌河后，突破了粤军的阻截，已胜利地转入赣南活动，我们便率部去那一带寻找迎接他们，而他们也知道了我们活动的情况，带领部队往这边靠，终于在永新县我们和由邓小平、李明瑞率领的红七军主力五十五团胜利会师。

小平同志把红七军五十五团带到江西崇义县后，与当地游击队配合，击溃了该县反动的地主武装，并攻占了县城。他们前委开会研究了下一步扩大武装，培养地方干部，发展根据地的问题，就由小平同志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1928 年 11 月至 1929 年 2 月，我曾在武汉李明瑞部工作，后因国民党特务查悉了我是共产党员、粤汉铁

路工人纠察队队长，党组织紧急通知我，立即离开李明瑞部，我才回到湖南工作。我们和五十五团会师时，我与李明瑞已有两年多的时间没见面了，北伐时李明瑞是国民党左派的一员虎将，到这时已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红军的优秀指挥员，大家重新会面感到格外亲切。

1931年，我率湘赣苏区代表到瑞金参加中华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专程去看望慰问了红七军。在红军总政治部，第一次见到了小平同志，虽然已经从李明瑞、袁任远及红七军许多指战员处，听到过邓小平同志领导、培育这支部队的情况，可见面一谈，小平同志的精明干练，思路敏捷，谈锋犀利而幽默，三言两语就能抓住问题本质的能力，深深地吸引了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①王震，原国家副主席。当时任粤汉铁路工人纠察队队长和湘赣红军独立师第三团政委。

②根据侯增中所写《纪念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六十周年——访国家副主席王震》一文摘编。

“哦！你就是邓小平同志！”我不禁欢呼起来。三四个月来，我经常得到他的许多宝贵的工作指示，解决了许多工作中的疑难，但却一直没有见过面。

——张云逸^①

从右江到百色^②

在南宁时，党决定加强右江地区的领导。1929年6月，先派雷经天等同志到右江，建立党的右江特委组织，加强党对右江工作的领导，恢复工会、农会的组织和开展群众的武装斗争。当时，党的右江特委机关就设在田东（又名平马），特委书记是雷经天同志。在特委的领导下，右江沿岸各县都有群众的武装斗争与韦拔群同志领导的群众武装呼应起来，声势更大。

在李明瑞、俞作柏同志到左江后，邓小平同志即率领着党委和在地方做秘密工作的同志先两天离开南宁，并指挥军械船和武卫部队，溯右江上驶。我带着教导总队及四大队，从陆路掩护前进。几天后，来到田东。从此，我们党便由秘密工作状态变为公开了。

我们到达不久，军械船也到了。过不一会儿，忽然看见叶季壮同志陪着一个不认识的同志，向大队部走来。那位同志中等身材，20多岁年纪，神采奕奕，举

止安详。我们连忙迎上前去，叶季壮同志就给我介绍说：“这位就是邓小平同志！”

“哦！你就是邓小平同志！”我不禁欢呼起来。三四个月来，我经常得到他的许多宝贵的工作指示，解决了许多工作中的疑难，但却一直没有见过面。小平同志也很激动，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放，同志的温暖感情充满心间，使我们一时忘记了说话。

坐下来后，雷经天和特委会的几位同志说，我们明天到百色去，大部分军械都带去，目前不用的重武器和弹药，则疏散到东兰、田东的山区里保存起来。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便马上行动起来，继续走了两天，到达百色。从此，小平同志就和我住在一起。这时已是 10 月了。小平同志首先召开了一个党的委员会议（后来称前敌委员会，书记是小平同志）。会上决定了几件事：

第一，公开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我们党的主张，发动群众。

第二，整顿、补充部队，实行官兵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发扬民主，反对贪污，反对虐待士兵。

第三，组织和武装群众，在有工作基础的地方，通过地方党组织，将枪支发给群众，以便进行反霸斗争。

第四，继续清洗部队中的反革命分子。

根据党委的决定，大家立即行动起来。

①张云逸，当时任广西省警备第四大队队长兼教导队副队长。

②节选自《百色起义与红七军的建立》一文。

邓小平态度和蔼地问我：“你原来是哪个部队的？”我刚准备回答，张仲良快嘴插言：“他参加过百色起义，在您当年领导的红七军当过战士！”

——冼恒汉^①

“想不到这里还有我的一个兵”^②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和经历，虽然各不相同，但在各自的记忆里，有的经历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有一件事，隐藏在我的记忆里很深很深，至今清晰如昨。

1958年秋天，兰州秋高气爽，瓜果飘香。当时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同志来兰州视察工作。一天晚饭后，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通知我和他一起陪同小平同志看电影。我乘车按时赶到省委招待所。在首长休息厅里，我向小平同志敬礼、握手。张仲良介绍说：“这是冼恒汉同志，是兰州军区的政委。”邓小平态度和蔼地问我：“你原来是哪个部队的？”我刚准备回答，张仲良快嘴插言：“他参加过百色起义，在您当年领导的红七军当过战士！”“啊！想不到这里还有我的一个兵！”邓小平同志问我百色起义后在哪个部队干些什么工作，我便一五一十地向他作了详细的回答，最后我说：“当年跟随您及张云逸同志出来的右江壮族人不多了。”“是

呀，我们是幸存者！”小平同志说。

看完电影，小平同志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嘱咐我好好工作，把军队的事情管好。我请他去军区检查工作，他说：“不行了，明天就走。”

这次，我和邓总书记相见的時間很短，也埋怨过仲良同志向我“保密”太严，我还有好多话没有同小平同志说哩！

当年，小平同志问我是“怎样参加红七军的？”拂去战争的烟云，往事浮现在眼前。我是 1929 年从广西田阳县师范学校参军的。

1927 年 8 月 1 日，周恩来、朱德、贺龙等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这消息像长上了翅膀一样，飞到我们家乡，学校、农村都暗地传开了。贫苦农民要想翻身过上好日子，就得拿起刀枪，和地主官吏拼。当时奉议的农民运动领导人黄治峰、潘宪甫、黄晋才等走乡串村，日宿夜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这时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警备第四大队，已于 1929 年 10 月中旬陆续开到恩隆、奉议、百色。国民党奉议县长曾伯龙已被张云逸以右江督办专员的名义押送省上（南宁）。当时，广西省主席俞作柏同情共产党，他的弟弟俞作豫是共产党员，担任警备第五大队队长，左江第五大队也于 1930 年 2 月 1 日宣布成立了红军第八军。

曾伯龙被押送到南宁，真是大快人心！农民扬眉吐气，神采飞扬，都说：“张督办好（共产党还未公开），

把压在我们身上多年的石头搬掉了。”

邓小平、张云逸的警备第四大队在这一带声望很高，给广大农民带来了莫大的希望。奉议、平马地下党领导的“农协”已派人到平马领枪。革命的形势似一座火山，眼看就要爆发了，一些地主老财的子弟见情已悄悄离开学校。

10月下旬，警备第四大队，同时在百色、平马、田州把反动的第三大队消灭了，田州战斗就在新街我们学校附近打响的。战斗结束后，有五六个带枪的宣传员到我们学校讲演说：“我们的军队是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是工人、农民的军队（当时还未打出红旗），专门与军阀、列强、贪官污吏作对，为穷人打天下。”还讲了马克思、列宁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事情，并号召青年学生参军。那时，他们讲的马克思、列宁和俄国革命，我听不懂，但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这我是懂的。我和同学们鼓掌、喊口号，高兴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宣传员离开学校，我和几位要好的同学当晚在右江岸边高谈阔论起来。有位同学说，警备第四大队帮助穷人，打土豪劣绅，是好军队，咱们当兵去。另一位同学讲，反正念不成书了，在家不是饿死，就是被官府抓去坐牢，干脆当兵去。我说，好，大家意见一致，走！找他们报名去。

年轻人办事天不怕，地不怕，干脆利索。第二天，我们找到那几位讲演的宣传员，要求参军，他们听说我们要参军，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说：“欢迎你们！”并让

我们回家跟家里人讲一讲。

我回到家里把事情向奶奶讲了，她先是愣神，后是抹眼泪，死活不让我去当兵。当然，这是我意料中的事。父亲去世早，奶奶让我上学，刚长大能帮助她干活了，却要离她远走高飞，她怎能不伤心呢？但我不甘心，死缠硬磨，直到她点头同意才罢休。我像个小马驹，又是蹦，又是跳。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第二天就踏上革命路程，边走边唱大革命时期流行的歌曲“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到田州我们一头冲进了宣传队说：“我们来参加你们的队伍，我们家里人同意了！”他们也非常高兴，当即带我们去田州新街的部队政治部宣传队报到。还给我们发了一套军服和帽子哩！

参军后，我们就跟宣传队的同志到大街小巷及农村去做宣传，贴标语，给讲汉语的同志当“翻译”。因当地老百姓都是壮族人，听不懂普通话，我们是学生，多少懂一些，但是说白话和普通话开始不流利，有些做长途生意的商人说得比我们好，人家还笑我们说的偏了。时间长了，壮话、白话、普通话我都可以讲了，工作起来方便多了。

1929年12月11日，举行百色起义，工农红军第七军宣布成立，打出了镰刀斧头的红旗。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我们部队改成红七军第一纵队，我是政治部宣传队的宣传员。从此，我在张云逸、邓小平，次后在任弼时、贺龙、彭德怀、关向应、肖克、王震等首长